

侨乡研究

近代广东侨乡生活方式与社会风俗的变化

——以潮汕和五邑为例^{*}

王元林 邓敏锐

(暨南大学 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关键词] 华侨华人; 广东侨乡; 生活方式; 风俗文化; 潮汕; 五邑

[摘 要] 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受海外华侨华人的影响, 其社会生活方式与风俗文化都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首先, 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出现了渐趋“洋化”的生活方式; 其次, 在风俗文化上出现了传统习俗基础上结合“出洋”的怪异习俗; 最后, 在社会风气上, 一方面出现了奢靡腐化的现象, 另一方面新的文明之风突起。本文以潮汕、五邑为例, 探讨海外华侨华人对近代广东侨乡生活方式与社会风俗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 D6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5)04-0056-07

The Change of Life Style and Custom in Qiaoxiang in Modern Tim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aoshan and Wuyi

WANG Yuan-lin DENG Min-rui

(Department of Histor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Guangdong Qiaoxiang; life style; custom

Abstrac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overseas Chinese, a great change of life style and customs occurred in Guangdong Qiaoxiang in modern times. Firstly, basic necessities of life in Qiaoxiang were westernized greatly. Secondly, some strange customs appeared which combined traditional customs with the new theme of Going abroad. Thirdly, some people became more extravagant while civilized behavior became fashionabl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aoshan and Wuyi,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hange of life style and custom in Guangdong Qiaoxiang and also tries to analyze the effects made by overseas Chinese in these changes.

侨乡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自侨乡形成之日起, 就与海外华侨华人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的海外移民以及海外联系, 不但在经济上、社会观念上给侨乡造成深刻的影响, 而且给侨乡的社会生活及风俗文化

也带来了重大变化。本文试以广东潮汕及五邑侨乡为例, 通过探讨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生活方式及社会风俗方面的变化, 对独具特色的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和文化作一概述, 以揭示华侨华人对侨乡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收稿日期] 2005-01-14

[作者简介] 王元林 (1968 -), 男, 陕西大荔人, 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和中外关系史研究; 邓敏锐 (1981 -), 女, 广东佛山人, 暨南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史。

^{*} 此文为暨南大学 2003 年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近代侨乡文化研究”(项目代号: 003JXQ018) 成果之一。

一、华侨华人与近代广东侨乡 渐趋“洋化”的生活方式

侨乡社会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联系和交往，较之非侨乡地区更为密切。侨乡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受到海外华侨华人的影响，在保持原有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亦出现了“洋化”的现象，生活方式逐步走向多样化和现代化。

(一) 在衣着方面，除了传统的衣饰外，还出现了西式的衣料和服饰。如在潮汕地区，据陈达在潮州侨乡地区所作的调查研究，当地的衣料除了本地及国内其他地区的之外，部分则是由外洋输入。这些外洋货种类多，且式样常有更变，有来自英、法、德、日诸国的“羽布”，也有来自英日两国的“竹纱布”，质地细软，都是制作西服之用的重要布料。他们在穿着上最大的改变就是戴外来式样的帽子，如暹罗式的头巾、马来式的绒帽、欧美式的呢帽等。另外，还穿上了西服和胶鞋、皮鞋。除了西服外，中山装、青年装、领带也相当流行。而女士的衣服也越来越洋化，出现了诸如西裤、对胸衫、恤衫、纱笼裙等新式服饰。至于在鞋子方面，有些地区的农民在下雨的时候穿上树胶套鞋，而一些较富裕及有知识的人家，也渐渐穿上皮鞋。与此相比，非侨乡地区受外界影响比较少，更能保持原来传统的穿着，呢帽与皮鞋则相当缺乏。^[1] 侨乡人们在衣服穿着上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海外华侨华人的影响。除了潮州外，在广东其他侨乡如五邑、广州等地也有同样的情况。^[2]

(二) 在饮食方面也渐渐出现了西式化的餐馆和相应的饮食文化。随着华侨华人回国人数的增多，追慕和猎奇外国的饮食成为风尚，于是涌现了一批经营冷饮、西餐的餐馆，且生意相当火红。据 1936 年的资料统计，仅台山县台城镇就有冰室、饭馆、茶楼 299 家。而台山广海 30 年代就有三间冰室，分别是美国风味的金龙冰室、南洋风味的新华冰室和墨西哥风味的墨京冰室，它们都是由归侨经营。同时，各位归侨老板还把外国的经营方式、糕点制作方法等带回家乡，^[3] 从而大大促进了侨乡饮食业向多元化的发展。当然，随着西式餐厅的出现，一些家庭的食品式样也发生了变化，

除了一些西式点心、菜肴如面包、牛扒、猪扒等，都摆上人们的餐桌外，市民们对咖啡、阿华田、牛奶、牛油、巧克力等西式饮料、食品都不感到陌生。^[4] 另外，烹饪以及一些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变化。煮菜喜用辣椒，待客以咖啡代茶，水果不再是消闲食品，而是成为主餐食品，牛奶成为一些家庭重要的营养食品。这些，在非侨乡的普通人家均是很少见的。在众多特色食物中，冷饮是最特别的。由于南洋地区天气炎热，侨民都比较喜欢喝冰冻的饮料，他们还把这种饮品介绍到国内，如刨冰、汽水、冰淇淋、冰咖啡等。这些冷饮很快就在侨乡流行并渐渐在其他地区的市镇和乡村通行起来。^[5] 有人对潮汕地区华侨家庭与非华侨家庭的食品消费、食品种类、品质作了比较，发现华侨家庭的食品消费高出非华侨家庭不止两倍半，食品种类较多，质亦较优。^[6]

(三) 在居住方面，涌现了各种新奇的中西合璧的侨房建筑。侨乡建筑是侨乡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其中，五邑地区的碉楼则是最具特色的中西结合的建筑。19 世纪，碉楼兴起于五邑地区，其中以开平最盛。据统计，开平碉楼最盛时期约有 3000 多座，现经开平市政府组织全面普查登记在册的为 1833 座，其中绝大部分兴建于清末民初。开平的华侨除了汇入大量的侨资建筑碉楼外，他们还为碉楼的建筑设计图纸或提供图样参考，如瑞石楼、贵通楼、西安楼等，都是由华侨亲自设计甚至监建而成。^[7] 其他各县也有数量不等且修建时间相当的碉楼，且大多与当地华侨有关。近代五邑侨乡的碉楼，外观造型除了中国传统的硬山顶式、悬山顶式，还融合了外国不同时期的建筑形式和风格，包括仿古罗马的敞廊式、哥特式，仿意大利的穹隆顶式，仿欧洲中世纪教堂式，仿中亚伊斯兰教寺院穹顶式等，具有强烈的开放性。此外，碉楼的建造讲究实用性，风水、治安两不误，还吸收了外国先进的建筑材料、建筑技术及装饰手法。此外，西方建筑风格还渗透到与当地人们息息相关的宗祠建筑中，使得最固守传统建筑风格的祠堂也被“西化”了。同样的情况亦出现在潮汕地区的宗祠建筑及大族宅院建筑中。此外，骑楼和围屋也

是颇具特色的侨房建筑。20 世纪 20 年代, 广州最早出现了骑楼, 其后全省各地雨后春笋般涌现, 尤以珠江三角洲和沿海、沿江城镇至为普遍。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 客家地区主要侨乡出现了营造屋宇的热潮^[8], 从而涌现了一批在“沿袭传统建筑文化之时试探性地借鉴外国建筑符号和建筑技术”^[9]的围屋。

侨乡建筑的大量修建, 既是华侨华人荣归故里、光宗耀祖、夸耀于乡邻的表现, 也是出于保护家财之需。除了兴建大量美轮美奂的民居外, 立祠堂、筑坟墓、设书斋等也是归侨必举之事。这种民风富有一定的历史性, 在潮州地区, “望族营造屋庐, 必建立家庙, 尤加壮丽。其村坊市集, 虽多茅舍竹篱, 而城郭中强半皆闾閻, 厚墙垣者。……家有千金者必构书斋, 雕梁画栋, 缀以池台竹树”^[10]。在开平, “自同治以来, 出洋之人多获资回华, 营造屋宇, 焕然一新”^[11]。其县志也言: “旧式居处方向不一, 门巷参差, 四壁不通风……近年来新建之村颇革前弊, 然尚沿三间两廊之旧, 若稍事变更, 便为村中干涉, 谓其有碍枫树, 自时局纷更, 匪风大炽, 富家用铁枝石子土敏土建三四层楼以自卫, 其艰于资者亦集合多家而成一楼, 先后二十年间, 全邑有楼千余座。”^[12]总之, 近代侨乡的新式建筑, 华侨既是积极的倡建者, 也是资金上的主要支持者, 更是建筑的主要设计者、监建者, 最后还是西方先进建筑技术的传播者。可见其对侨乡建筑影响之深。

侨乡地区的建筑虽然体现了中西合璧的风格, 但因模仿或应用不当, 也出现了一些不伦不类的现象。例如新式的游泳池水因是引入河水, 常有牲畜的秽物流入; 室内既贴有西洋广告画片, 也悬有中国古代山水画作。^[13]大体而言, 华侨社区的房屋比非华侨社区要高级得多。据相关调查, 20 世纪 30 年代初, 华侨社区的上等房屋估价是 10000 元 (民国国币) 以上, 而非华侨的则是 1000 元以上; 相应地, 华侨社区的中等房屋估价是 4000 - 9999 元, 而非华侨社区的中等房屋是 500 - 999 元; 华侨社区的下等房屋估价是 1000 - 3999 元, 而非华侨

社区的则是 250 - 499 元。可见差别之大。^[14]

(四) 在交通、通讯等方面, 华侨华人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回家乡, 带动了当地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新发展。近代侨乡的交通形势可以说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昔日的官道驿铺、帆船小艇逐渐被新型的公路、铁路、电船、汽船所代替, 并且还出现了航空线路, 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交通网络。就潮汕地区而言, 据民国《潮州府志略》及《潮州志》记载, 光绪十八年 (1892), 汕头、潮阳开始行驶小汽船, 此后其势日盛。1920 年, 进出汕头港的汽船共 2496 艘。除了汽船外, 电船、民船也是当时常用的水运交通工具。1933 年, 潮州的客运电船大小不下百艘, 民船更是多达七百多艘。市内开辟了定期航线, 国内至厦门、福州、上海等地, 国外至暹罗、安南等地, 均有船只来往, 交通极为便利。而在陆路方面, 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 由苏门答腊华侨梅县人张煜南等倡办潮汕铁路并于是年十二月由潮汕铁路公司立案, 次年开始兴筑, 至光绪三十二年 (1906) 潮汕铁路正式通车。民国时则汕樟轻便铁路、潮汕电车铁路相继举办, 颇盛极一时。而公路的修筑更是如火如荼, 潮州共修省道、普路约有 70 多段。1938 年仅潮州东路就有大客车 378 辆, 货车 98 辆, 小包车 30 辆, 合计 506 辆。至于航空事业, 1934 年中国航空公司^[15]粤线开航设于汕头港。^[15]

在五邑侨乡, 1906 年台山就出现了新式的马车拉人载货, 后来还发展成为马车运输业。在新宁, 1909 年修筑了新宁铁路, 大大发展了运输业。20 年代以后, 自行车、摩托车成为富人的代步工具以及富贵身份的标志。^[16]这些新型交通工具在国内乡村的应用时间比较早, 具有开创性。可见, 自清末起广东侨乡交通运输已十分发达。

在邮政、通讯、照明等方面, 电报、电话、电灯等先进机器设备的传入, 大大便利了当地人们的生活。在广东侨乡, 各地纷纷成立邮政局, 一些地区还开设有线或无线电报、电话。如在潮汕地区, 光绪二十三年 (1897) 汕头开始设邮局附海关内; 光绪九年 (1883) 则架设福建经汕头到广州电线, 实现有线电报;

1924年汕头设立官用无线电,实现无线电报传输,至1926年开放民用;1911年始办汕头澄海民用电报,以后逐渐发展,乃至全市用户达千号;汕头到广州、厦门、福州、温州、上海更是开通航空邮递。至于照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潮人方仰欧等创办昌华电灯公司,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顶让他人改设开明点灯股份有限公司,至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实行全面放电。电灯不仅进入到家家户户,同时还藉此在必要路段修筑了路灯,以便利群众出入。^[17]侨乡交通、通讯、照明事业的发展,均离不开华侨华人的积极投资与建设。

近代广东侨乡新的生活方式的注入,华侨华人起到了重要且积极的作用。他们的侨汇为侨乡新生活的直接提供了经济来源,而他们自身在海外习得的生活习惯,则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侨乡生活方式渐趋“洋化”,丰富了当地人们的生活,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也给当地向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当然,华侨华人对侨乡生活方式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下面将有论述。

二、华侨华人与近代广东侨乡独特的社会风俗习惯

(一) 广东侨乡畸形的婚俗

侨乡男青年多出洋谋生,他们远在地,一时难以回国娶亲,就由男女双方父母包办婚事,于是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婚俗,如“嫁公鸡”。对此,一些侨乡的方志如此记载:番禺侨乡青年出洋谋生,“若其家已为聘妻久矣,不归,则仍迎娶如仪百辆既归,礼行交拜,新妇女左侧必缚一雄鸡以代之,俗谓之生鸡见礼”^[18]。这种奇特的拜堂仪式,在广州及其他侨乡中都很普遍。在五邑地区则是由堂倌捧着新郎的衣物以代新郎与新娘行交拜之礼。但公鸡仍是必需的,是晚公鸡需被绑在房中,和新娘共渡“良宵”,直到天亮才能将公鸡捧走。^[19]这就是广东侨乡中的“公鸡娶妇”,是侨乡的特色风俗之一。“公鸡娶妇”显然很荒谬,这是只有在侨乡特有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才可能出现的“时代悲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侨乡社会中衍生出一股争嫁华侨

的怪风气,这种“争嫁”既有自愿的,但也不乏被迫的。由于华侨家庭有侨汇收入,经济水平较高,很多人宁可嫁给从未见过甚至可能永远都无法相见的华侨,也不乐意嫁给一般的男青年。这就导致了家庭问题以及社会问题。对于女方来说,需长年累月饱受与丈夫离别之苦,如是被迫嫁到华侨家的,那就更苦不堪言了。丈夫既不在,膝下又无儿,孤苦伶仃,常受到外人欺负。一些华侨虽有心接妻儿出洋,但家中父母恐不再有侨汇,常持反对意见。也因此,华侨世界中出现了“两头家”的普遍现象。即除了家乡的妻子外,在海外也有一个家。这是时代的产物。“两头家”的家主,对于两个家庭各负其责,但也有很多男子在海外成家后,往往渐渐疏远家乡妻室,以致没有汇款或家信寄回。可见,畸形的婚姻给妇女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也带来了不少家庭问题。

“嫁公鸡”仅是侨乡畸形婚俗的一个典型的缩影。除此之外,在顺德、中山、南海和番禺等经济较为发达的侨乡地区还存在着女子“自梳”和“不落家”的风俗。很多女子出于对传统封建专制婚姻及夫权压迫的不满,加上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因此自行梳起头发以示不嫁,终身独老;而一些结了婚的妇女也常住家中,避免与丈夫同居,于是产生了这一特殊群体,称为“自梳女”和“不落家女”。

随着“嫁公鸡”习俗的产生,相应地则出现了养螟蛉子的风俗。新婚之后,丈夫有的三五年后回来,这是比较幸运的;有的十年八年都不回来,女方就会去领养一个男孩作为后嗣,这孩子就叫螟蛉子。^[20]此外,一些华侨自己无子,往往就买人家的男孩做儿子。他们通过收养义子,以保证自身家系得以延续,重要的是确保其财产的继承权及在本族宗祠内的地位。在当时匪患严重的侨乡社区,增加男丁则有利于增强对家族资财、地位的捍卫。而一些华侨在海外的事业也有望得到继承。因此,尽管收养、购买螟蛉子不是侨乡特有的现象,但却是侨乡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其出现的社会原因较之于非侨乡地区更为深刻、复杂得多。

(二) 广东侨乡与“出洋”结合的特殊习俗

早期的海外华侨大多希望落叶归根，但毕竟有客死他乡的，由于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把灵柩带回家乡，于是就出现了特有的“招魂”习俗。侨乡人们十分重视对客死他乡的亲人举办“招魂”仪式。这种“招魂”习俗乃是侨乡很多青壮年背井离乡、魂断异国这一社会环境的产物，它充分表现了海外华侨华人强烈的落叶归根意识。在五邑地区，这种风俗相当普遍，并有很具体的仪式。^[21]此外，个别侨乡地区还出现了其他特别的习俗，如在潮汕侨乡，较为流行的就是“送顺风”。侨乡中有人要出国或是返回侨居地，亲友邻居就拿些礼品去相送，俗称“送顺风”，即祝离家者一路平安，顺风顺水。而当华侨归来，亲友也会送来礼品，表示接风或洗尘，俗称“落马”。华侨较多的侨乡，还会在农历八月，由侨户凑钱请人来演戏酬神，目的是祈求旅外亲人平安，俗称演“顺风戏”或“番客戏”。^[22]此外，广东客家人和潮汕人在正月初七还有吃“七样菜”或“七样羹”的习俗，各类菜均有特定的含义，此俗本是传统的习俗，但后来发展成与当地入闯南洋和华侨寄“番批（南洋钱）”有关。^[23]上述习俗是基于本土传统文化、习俗的基础上，再结合华侨到海外谋生这一新的主题发展变化而成的，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这些习俗的盛行，充分反映了出洋之人强烈的故土观念，侨眷对海外亲人的惦念及祝愿之情，深刻体现了华侨与侨眷之间浓浓的血缘关系。

三、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渐入奢靡而又渐兴文明的社会风气

（一）广东侨乡渐入奢靡的社会风气

大量侨汇进入侨乡，除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繁荣外，也带来了崇尚奢靡的社会风气。光绪《新宁县志》（1914年改名台山县）指出：“近年藉外洋之资，宣讲堂、育婴堂、赠医院、方便所、义庄，诸善举所在多有。但民风渐入奢靡，冠婚之费，动数百金。田既硠薄，力复不齐，岁入粮食，仅支半年，余则仰给洋米；倘舟楫偶梗，炊烟立断，是诚可忧。”^[24]光绪期间任新宁县知县的李平书所著《宁阳存牍》也说：“宁邑地本瘠苦，风俗素崇

俭朴。自同治初以来，出洋之人多获资回华，营造屋宇，焕然一新；服御饮食，专尚华美；婚嫁之事，尤斗靡夸奢，风气大变。^[25]时开平也“风俗日趋浮靡，踵事增华”^[26]，当地嫁娶，有中人之家动辄就千金或数千金不等，嫁妆及酒食等都相当奢侈。^[27]除了五邑地区外，其他侨乡此种夸耀奢靡之风也相当盛行。在东莞，“嫁女以妆奁相夸耀，丧礼祭而侈，动费千金”^[28]；在始兴，风俗本来淳朴，“近年以来，求衣服饮食渐即奢华，冠丧祭动费千金，不特城市为然，远而乡曲类皆相牵成风”^[29]。

侨汇的大量输入，对侨眷的影响最为重大，一是很多侨眷子弟依赖侨汇过着游手好闲的“二世祖”生活。华侨与家属聚少离多，侨眷对子弟管教少，溺爱多，不少华侨子弟长期过着不事生计的生活，甚至染上嫖、赌、饮、吹各种恶习。在侨乡就有不少民谣反映华侨子弟因有侨汇而不事生产的民谣，“牛耕田，马食谷，老豆（父亲）赚钱仔享福”；“银仔白，金仔黄，唔（不）好阿哥花精光，卖田拆屋唔（不）够使，爷娘痛哭嫂投塘”，^[30]另有“死仔狂，有书唔读随街荡，终须荡去赌博巷，输尽家财还被绑”^[31]。以上正是一些侨乡子弟的真实写照。二是侨乡中的妇人也仰仗侨资，过上了懒惰的奢靡生活。时人描述：“……降至于今，营业日艰，生计困苦，男则有出洋之举，女则有辍耕之行，于是奢靡之毒渐侵，偷薄之风日盛，遂将旧有之耕作及织麻作线缝衣等等，俱抛除不为。故今日机杼之声，不闻于户，刺绣一端，过问无人。一家数口，皆瞻仰外洋之资，甚至以懒惰不事为轻闲福，赌博浪游为消遣术，反鄙家政为琐屑龌龊，高其身价而不为。故奴婢也纷纷购请，习俗所趋，遂使贫贱之家，亦尤而效之。耻谈家政，好言高远；新名词语，冲口而出；娇奢气态，迎面扑人；衣服时装，日新月异；金玉首饰，千般万化；石岐来往，三天一行；一衣一衫，付之缝工；一线一履，购之于市，不惜男子远涉重洋之艰苦……”^[32]。当地仍不乏对侨眷糜烂生活的报道，如1920年中山县报道乡中妇女常“三五成群，以樗薄为消遣，某处附近，骨牌之声，达于户外，无日无之”，“本乡郭赞塚屋

内,有人私吸洋烟,聚集乡中子弟之有烟霞癖者,在此横床直行,通宵达旦,如兰气味,送于户外,街邻啧有烦言^[33]。为迎合侨眷的奢靡生活,侨乡各地圩镇的烟窟、赌馆、妓院林立。这些奢靡的风气及腐化行业,使侨乡人们深陷其中,不仅自身受到莫大的毒害,而且损害了当地的社会风气,其“败坏不可胜言”^[34]。对人们的生产活动也带来重大的影响。人们仰仗侨汇度日,不事生产,以致农业生产等停滞不前,使侨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了畸形的消费社会,并呈现一派虚假繁荣的景象,如五邑地区正是“社会情形顿呈外强中干之势”^[35]。因此,很多有识之士常对这种陋习奢风口诛笔伐,深表忧虑。

(二) 广东侨乡新的文明风气兴起

侨乡奢靡腐化之风虽然很猖狂,但仍有不少新的文明之风兴起。西方先进文明的传入,打开了侨民的眼界,使很多人认识到社会文明的重要性。一些有识之士更是极力主张开通民智,革除陋俗,提倡新风尚。这些新的文明风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某些地区出现了新式婚姻。新式婚姻在广州比较流行,而在一些偏远的侨乡,旧式婚姻也受到一定的冲击。在潮汕地区的大埔县,婚礼乃是融合新旧而成,“新婚之礼亦杂旧礼行之。纳彩,过定,送日子等事,均多仍旧,惟结婚之日另设礼堂,礼节照现在规定之新礼行之”^[36]。

二是出现了新的教育风气。一方面,新式学校和大型图书馆的兴建对当地民智的开发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华侨对家乡教育的重视提高,越来越多的新式学堂于各地建立。据不完全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前台山县由华侨、港澳同胞捐建的学校就有84所,恩平县有13所,花县则有10多所。^[37]除了建立学校,也有兴建图书馆的,如在开平,短短七年时间,全县就有华侨兴建了周氏通图书馆、司徒氏图书馆和关氏图书馆。^[38]这些学校以及图书馆的建立,为学子提供了新的学习场所,使其大大开阔了视野,增长了各方面的学识。如今,上述某些学校和图书馆仍在当地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侨乡中兴起学英文热,尤其是在青少年队伍中,诚如中山《竹秀园月报》记

载,中山地区的少年,因为多欲往外洋谋生,于是对于英语这一新科目尤其重视,很多人都去向当地西方侨民求学。^[39]

三是大倡注重卫生之风。当时很多侨乡乡报都较多地涉及到卫生方面的问题,如《竹秀园月报》开设“新知识”一栏,里面多提及各类卫生知识,包括较为专业的医学常识,如“刷齿之良法”、“怯病二十则”^[40]“人体卫生研究”、“眼之卫生”、“冬令应知之卫生”等,此外也涉及到一些卫生小常识,如“果物能疗病”、“盐的效用”、“衣服沾污的洗除法”^[41]等。在卫生方面,得到最大改进的应当是对排污物的处理。由于乡中有识之士的极力提倡以及华侨华人的大力支持,很多侨乡都采用了新式厕所,大大改善了当地卫生环境。

四是出现了新的娱乐方式。在一些侨民当中出现了艺术化的消遣,闲来无事就看看书报,玩玩乐器,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如网球、篮球等。^[42]台山还曾因排球运动普及而被誉为“排球之乡”。而电影更是作为一种新的娱乐方式深入到民众生活。就广州地区而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侨不仅在广州创办电影院,还投资办电影制片公司。当时办电影院最为有名的华侨就有陈汉子、朱荫桥,二人所办的影院有西堤、中山、中国、西濠、中兴、新华、金声等,且设备、场地都居当时最高水平,吸引了不少观众。^[43]

五是出现了土洋结合的方言,一些新的文明用语也渐被应用。如称赞他人好称“骨”(good),很好则称“伟里骨”(very good);再见时讲声“拜拜”(bye - bye);上厕所叫“去洗手间”,等等。这些方言及文明用语的应用,既丰富了人们的语言,又加强了人们的开放意识,并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侨乡语言文化。^[44]

综上所述,近代广东侨乡在生活方式及社会风俗方面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海外华侨华人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与侨乡人们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积极投身于家乡各方面建设的行为,促使侨乡在各方面发展都先于其他地区。侨乡是一个特殊的社区,它对外来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文化都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与兼容性。侨民对于外来事物,较之于

其他地区的人们表现得更为敏感,因此也能较快地接受外来先进事物的影响,华侨华人于此则成为了重要的传播者。生活方式的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社会风俗的形成也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其发展也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因此二者都是在接受时势、传统等挑战的过程中,不断适应自身和周围环境的基础上而发展变化的。它们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甚至带有盲目性。所以,在强调华侨华人对侨乡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注释]

- [1] [5] [6] [14] [42]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9-103、124-125、113-115、106-111、258-259页。
- [2] [3] [13] [16] 刘权:《广东华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24、425、123、425页。
- [4] [20] 张国雄等著:《五邑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3、224页。
- [7] 梅伟强:《开平华侨与碉楼建筑》,《五邑侨史》2003年第24期,第27-30页。
- [8] [22] [30] [37] 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华侨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4、173、154、151-152页。
- [9] 唐孝祥:《近代岭南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新建筑》2002年第5期,第40页。
- [10] (光绪)《潮州府志》卷十二《风俗》,清光绪十九年(1893)重刻乾隆四十年本。
- [11] [25] (清)李平书:《宁阳存牍》(不分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粤东省城刊本。
- [12] [27] (民国)《开平县志》卷五《舆地略》,据1933年香港民声书局铅印本影印本。
- [15] [17] 参见(民国)《潮州府志略》(不分卷)附录三《潮汕现状》,1933年铅印本;饶宗颐编:(民国)《潮州志》之《交通志》、《大事志》,1949年铅印本。
- [18] (民国)《续番禺县志》(不分卷)《风俗》,上海图书馆藏抄本影印本。广东方言中,雄鸡常称为“生鸡”。
- [19] 李松庵:《广州几种光怪陆离的行档》,见《广东风情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3页。
- [21] [23] 刘志文主编:《广东民俗大观》(上),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762-763、547页。
- [24] (光绪)《新宁县志》卷八《舆地略》,1921年铅印本。
- [26] [35] 同[12],卷二《舆地略》。
- [28] (民国)《东莞县志》卷八《舆地略》,1927年铅印本。
- [29] (民国)《始兴县志》卷四《舆地略》,1926年石印本。
- [31] [44] 梅伟强、张国雄主编:《五邑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3、368页。
- [32] 干鸿:《论我乡妇女之坐食》,见《香山良都竹秀园月报》,1920年阴历十二月初一日,第4期,第8页。
- [33] [39] 《竹秀园月报》之《本乡新闻》,1920年阴历九月初一日,第1期,第10、11页。
- [34] (民国)《始兴县志》卷四《舆地略》,1926年石印本影印。
- [36] (民国)《新修大埔县志》卷七《礼乐志》,1943年铅印本。
- [38] 同[12],卷八《建置略》。
- [40] 《竹秀园月报》,1922年12月1日,第27期,第50-51页。
- [41] 《竹秀园月报》,1931年1月1日,第124期,第54-65页。
- [43] 龚伯洪:《广府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0页。